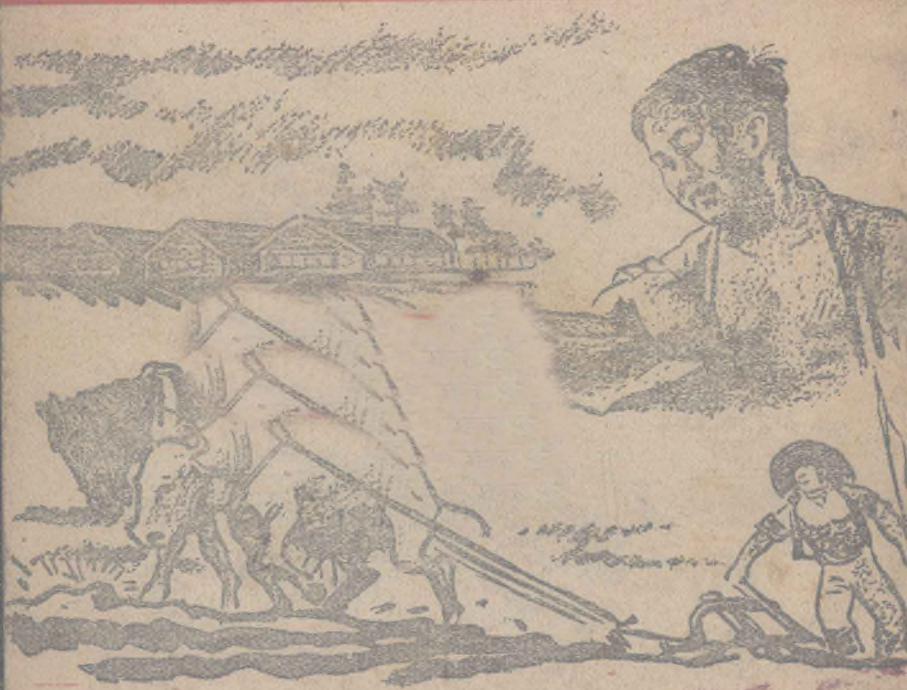


夏陶然的路道

劉子久著



北京書店印行

夏陶然的道路

东北书店印行

夏陶然的路

著者 劉子久等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一廠

桂林 木斯 哈爾濱 東安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延吉 寶錦 勃利 鶴立
敦化 湯原 依蘭 輝南
營東 安圖 蛟河 拜泉
克山 海倫 雙陽 梨樹

定價 冊 每

元

民國卅六年九月初版 15000冊

目 錄

夏陶然的道路……………	(一)
讀完『夏陶然的道路』……………	何啓君(一〇)
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劉子久(一二)

夏陶然的道路

按：夏陶然，是我們大家所久已熟悉而且仰慕的名字。過去獅子山同志會特別表揚過他。但到現在我們才收到這個生動具體的工作報告。他是一個八路軍的彩戰士，曾與敵人搏鬥數十次，陣亡兩次彩，因身體虛弱才從部隊醫下來，被派作中華小學校長，現被選為華中青年聯合會執委。很年輕，只有二十五歲。這篇文章就是他的工作報告，稍加刪改而成的。

解放日報編者

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 比開荒還難

我到校的第一天，鄉長找人給我搞伙食。老百姓都不肯，說從前×校長一天幾碗菜，還不給菜錢，大家吃雜糧，他要吃好麵。

我只得親自去動員，老百姓還是推說他家沒好菜吃，我就說：『我不是從前的×校長，菜好不好不要緊，沒有菜也行。』那家子聽了我的話才好了一些。他又說：『說起×校長，我們實在供不起，吃好麵還不說，就是鹹大了些，他聞一聞就不吃。臨走時，他說他領下的是雜糧，吃的好麵，不好意思，說把雜糧賣了再給錢。可是，到底連一個錢也沒給，都帶走了。』我連忙解釋：『我可以先給你一個

月的糧食，你家吃什麼我也吃什麼。」這才說通了。

第二天，我請鄉長幫助動員學生。誰想，人家都說「我們不上什麼學。」有一家又驚又怕的說：「先生，做做好事，留下我家的孩子吧！別再糟踏他了！」我覺得奇怪，追問她，她才告訴：「×校長硬把我家孩子逼到學校裏，說不去就抓人。沒想到去了幾天，就把小孩子打得眼睛都出血了。」

經過了解釋，總算有了八個學生願意上學了。我先找學生問問從先的情形，他們說：「×校長有八天沒給我們上課。我們背不出書來，就打。看見我們吃花生，就罰我們回家拿花生給他吃。」我只好嘆氣。可是八個學生怎麼能開學呢？

那時，剛過年才幾天，我就把一個月的糧食，扣下必須吃用的，其餘便去換了些禮品，找鄉長陪着去向幾家士紳拜年。鄉長向人介紹我文化高，能力強，可是我只上了五六年私塾，在部隊裏幹了幾年，從沒教過書。聽着，心裏發急。

後來我向臨近一個小學校長去求教。他聽了我的話，也只嘆氣說：「整理辦油了的學校，比開荒還難哩！」

二 開 學

學校開學了，我預先聲明不打他們。學生和學生的家長都不相信，甚至不同意。學生們見我好說話，常求我講故事。我只有槍桿子的故事，我講前方的情形。學生們又要我教唱歌，我不認得什麼

諧，實在張不開口，只好把在部隊裏學的幾個教給他們。學生們跟我親近起來了，晚上還來找我。可是他們總共也才有十多個。莊上一家有喪事，我賒了點紙錢去燒，居然又來了幾個學生。

學屋太歪了！一下雨就不能上課，學生向我提議找鄉長請人修，我想，找民佚定遭反對，我向學生提議自己修：

『粗活我幹，其餘大家幹！求人不如求自己！』

學生們都很高興，分了兩個組。找工具的、拾水的、泥牆的，一天功夫完成了。莊上一個姓林的老先生不相信，說×校長這樣厲害，修了幾天沒修好。就在第二天親自走來一看，向我點點頭：『倒管呢……還結實。』

三 這是學校的祖業

學校屋後有點地，我提議生產。學生有的主張種菜，有的主張種瓜。我看生產救荒，應種些長能吃的，於是決定先種菜。

全校大小學生分成兩個組，便開始挖土，可是土質又堅又硬，挖不動，學生提議借犂耕。不巧，一下犂弄毀了。這下子家長便有話說了：『一天到晚不好好管教學生唸書，倒幹什麼活，又不是他家祖業，這麼起勁，現在犂毀了，看他怎麼辦！』

我一面叫學生解釋，說這確不是我的祖業，這是學校和大家的祖業。一面又買了一個新犂，去賠償。那家見了舊的換了新的，才又說了客氣話。

種下菜，每人又種了兩棵樹，又想種麻了。沒有麻籽，發動學生回家找，家長又惱了：『看他樹根底下能長什麼，那還不是糟踏！』學生偷偷地把麻籽送給我，家長更惱了：『上學不幹點好事，沒規矩，那像個學校，明天還不如留在家裏幹活！』

學生澆水勤，菜長得快。收割最大部份分給莊上窮人炒豆餅吃了，學生家裏窮的也分些。分不到的學生就埋怨：『澆水出力倒落不到吃！』我說：『給窮人吃了，就算做了一件好事。』他們也沒話了。

四 『紡蠶子上山、前（錢）心重』

菜吃完了，又種黃瓜和棉花，可是棉花地沒有糞，學生說：『先生上回出錢買犁，這回我們出錢買糞。』我想野地裏有的是豬糞，拾就是了。每天三遍：清早起，早飯後，放了學，各一筐。此地人懶不去拾，我一個人三天就積了一大堆，學生也跟着來了。

可是莊上那些二流子甩大袖子的，眼紅了。問我拾糞不嫌髒嗎？我說：『髒，吃起來可香呢！』他們又問：『這許多糞可賣？』我說：『生產用的，不賣。』

有的人便暗地裏罵起來，說我：『紡蠶子上山，錢心重。』又說我下賤，我不作聲。後來，他們越看越眼紅，也搶着來拾了。

春荒嚴重起來，有六個學生家裏沒有糧食，也沒牛車，家長要學生去拔草，我便和學生們商量：『我給你們想辦法，又能拔草，又能上學可管？』學生當然贊成，分頭回家說去，可是都遭反對。說是再上學難道先生給飯吃不成？沒辦法，我買了些紙烟把學生家長都請了來，說明了意思，他們還是

不贊成。認爲又上學又拔草是『駝子跌脚，兩頭不着實』，還不如請幾天假。

我拉通了那個姓林的老先生（我很尊敬他，他也私下稱我『這孩子』，說我對他倒不錯），推動他一說，有五家勉強答應了。學生們很高興，編成一個割草小組，選了一個小組長，每天上午回去拔草，中午回來。我給他們過秤，割的最多的獎他們一兩支粉筆。下午來學校上課。他們拔了草，功課也沒掉；拔草的時候，還能自動的複習。

另有一家姓趙的有牛沒人放，怎麼也不讓他兒子上學了。孩子苦着臉來找我，我要割草小組開會出主意，他們要姓趙的這孩子一起去，一起回。故意少拔些草，再走他家門口過，第二天果真這樣作，他父親見人家孩子拔得多，自家孩子拔得少，便罵他的孩子，拔草小組故意逗他：『我們上了學，才拔得多！』姓趙的家長不相信，說是他孩子幫人拔了，拔草小組說：『拔草，是跟先生學的，先生一教就拔得多。』姓趙的家長又氣又惱的說：『隨你去吧。』孩子跟着拔草小組半天上學，半天拔草，比在家拔一天還多！

五 『我不是咕嚕子……』

『四四』兒童節，輔導區舉行比賽。學生們天天一早就來學校，又練習唱歌，又讀書。比賽時得了個第一，大家很高興。

天熱了，莊裏家家戶戶編草笠去換糧。有十多個學生，家長不讓他們來上學。他們晚上偷偷跑來找我，要我晚上教他們識字。我讓他們自己編個組，我買燈油教他們。可是，因爲學生天天想上學，

在家裏不安心，家長們也不高興。我到縣府文教科借了五百元，三百元借給窮學生家長做本錢，要學生拿着竹子等材料到學校裏來編。剩下的二百元，我自己買了些材料，成立了兩個筆笠小組，集體生產；讓學生選舉一個生產管理委員會。錢、材料、編成的筆笠，都存在學生家裏，每天總結一次，學生自己記賬，學的算術也用上了。

筆笠編的很快，第一次賺了五百元，分給各家買糧食吃，本錢又留着作生意。後來本錢還過了，還剩四十多個筆笠。

莊上人說我這種行徑很奇怪，我說：

『我不是蝟螻子……』

六 夏收工作

麥子熟了，學生們放假回去，多半要幫助自家收麥。我幫幾家抗屬烈屬下田去收。莊上人說我作賤。那些甩大袖子的故意跟我講：『你放了假，坐着，躺着還怕不給你飯吃！』有一個學生的哥哥在部隊裏工作，這回回來，他父親就要留他在家裏收麥子，他哥哥硬是走了。他父親可生了氣，罵那學生：『都叫你們上學唸書，給八路軍迷了心去，一個也不要家了，你們都給我滾。一個也不要回家！』孩子跑來對我哭，我說明天幫他家割。

第一天我去了，那老頭子怕我不會割，要我看麥子。我還是割了，但割了一溜，手就破了，我沒作聲。可是身體不好，實在困了，倒在一邊躺着了。我醒來一看，不好了，人家已經又割了一大溜

了。我連忙幹，還好，後來還是趕上了。

割了兩天，湖地全割完了，我想回去給別人割。可是他要我到河西去看麥，我到了河西又給他割了兩天。割完，他來說找不到人，要我幫他打場，打場倒容易，可是我不會。我找保長換工，保長替我揚，我替他割。完了，老頭子還不叫我走，我想看他怎麼弄？他要我曬麥子，我就曬了。曬完，我又給堆上，他這才滿意。臨走，我給他說：

「我幫你幹活，你可不要罵你的兒子上學了。」他笑了。

七 學生喜歡我，我也喜歡學生

莊上的私仇很厲害，一家姓潘的，一年被人給放了四次火。火燒了，莊裏人都圍着看，誰也不去救一救。那次我一個人上去救了。救完火，我去查問究竟，給他們說和，排解。

我沒有衣服穿，老百姓又沒有空，我就在禮拜天給老百姓鋤地，他們給我衣服做起來。

本來，要我教書，實在是『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我只好常到旁校參觀，自己也想點小辦法。我教種茶種棉，就叫學生去看看老百姓怎樣種，再在自己學田裏學着種。錯了，討論糾正。我教他們『常識』，講到人離不開空氣，就叫他們把門關上，大家覺得悶的慌，就都知道了。

因為我文化低，教書又不能馬馬虎虎，所以課前我總要好好準備。學生問我字，我沒有字典，不認得就去問那個姓林的。我也問學生，拾糞的糞叉子，我寫不上來，學生告了我。『國』字，我念作『鬼』字，學生笑了，說應該念作『果』（國字那地方讀作『果』），我也學會了。

我的身體不好，精神來不及，就要大學生教小學生，有時比我教的還好。二年級一個姓趙的，才九歲，很聰明，另外有個八歲的孩子，很笨，我儘教教不好，就要姓趙的教他，沒一個月把一本國語都教會了。識字班，民衆夜校，現在也都由他們自己進行。

學生的管理，現在也都由他們自己管理了，不用我操心。起先管不好，好一點的學生向我提議：『犯規的該打。我問大家『願意打，還是不打？』大家都主張打，連壞學生也願意打。可是，我還是不打，我把最調皮的學生編成一個小組，排隊站著頭先，每一天讓他們記下『調皮賬』，打架幾次，罵人幾次，然後公佈，要他們改。多數都改得很快。也有老臉皮，給他說過了，又忘了，我就要大家『罰』他，有一次『罰』哭了，我再哄他，也就改好了，而且進步特別快。

兒童團，除了自治，互相幫助學習，就是辦識字班，民衆夜校，查路條和站崗。有一次，從浮山來了兩個便衣戰士，拿着槍。小的一個學生怕，大孩子說：『怕什麼？夏校長也是當兵的！』就上去要路條。那個戰士不理，嚇唬那兩個孩子說：『把你們的眼睛扣出來！』學生怕得跑回來直哭。我出去一看，那一個戰士剛要過去，我問他們要路條，他們說：『沒有』。我說，既沒有路條就把槍放下，他見是我，不敢揮動。以後浮山檢查所寫信來，才放走。這一下，兒童團更積極了。

八 收場教育開辦起來了

我們的收場教育開辦起來了。男孩子有三十人，分兩隊，由積糧份子擔任隊長，也有團長；另外還有八九個女孩子，也編了一個隊，是由學校兩個女生教的。因為他們害羞，初上來不敢見人，只好

由女生教，時間長了，也就好了。

收場教育能辦起來，首先是抓緊了積極份子。再由他們來活動與組織。在沒有領到書以前，每天寫紙條子來教的。

頭一天教：我們是放牛隊，你們是割草隊。

第二天教：放牛割草，也要讀書識字，才是好兒童。

第三天教：放牛好，割草好，讀書識字更好。

小孩子，晚上回來，拿紙條問老板，老板也教他們並且很高興。他們問我：『忙湖（地裏）又忙家，能忙得過來嗎？』

領到書以後就不寫紙條了。他們學得很快，一個小孩子已經認得五十七個字。

小孩子在湖裏，每天看見我去時，就跳着叫着不知如何是好。教過課後，他們還在一塊討論。我給他們一塊小黑板，每天給一支粉筆，叫他們練習寫字。他們晚上回來，把牛一拴就跑到學校來。除了唱歌以外，我還得教他們念書。

我上次到縣裏開會，他們問我：『你什麼時候回來呢？我們都等着你。』

因為天氣熱，他們怕我太累了，都願意到學校裏來上課。現在是由學校的同學們教的，他們教學活動都在中午。那一組放牛孩子來齊了，負責那一組的同學就去教。總之，他們各找時間，每天都要上課。晚上，大家又都集會到學校裏來唱歌。

我們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起來的。

讀完『夏陶然的道路』

何啓君

『夏陶然的道路』在教育上提供了許多新的東西，在羣衆工作特別是在青年羣衆工作上，則有着更爲新鮮與豐盛的發揮。

青年羣衆工作在農村，在新政權樹立之後的農村，該作些什麼，並怎樣去作呢？這是一個沒有得到完滿解答的問題。『夏陶然的道路』在這裏就給予我們若干深刻的啓示。

在農村中工作，目的是爲了革新農村，提高農村，爲了這個目的，就必須使工作適應農村的條件。

夏陶然的編筲笠，割麥子、割草、拾糞、種菜、種棉、修房子、組織放牛娃、辦識字班、民衆學校，以及站崗放哨維持治安；直到他的布衣粗飯，年節禮還，無論從工作的內容，從工作的方法來看，他都是首先適應了村子裏的條件與可能，又轉而超出了那舊的藩籬，提高其原來水平。有適應，有鬭爭。

只有善於合度的適應，善於合度的鬭爭，並善於運用此二者之結合的人，工作才會搞得出色。

夏陶然的工作，總是緊緊與生產密切結合着的。青年特殊要求有時會和家庭整個要求，發生一定

程度的矛盾。當春荒嚴重時，每個家庭都要他的兒子回家去割草，當初夏，糧食發生青黃不接時，每個家庭都要他的兒子去幫助編竿笠，賺錢吃飯。在這樣的時候，夏陶然既不是完全停止學生讀書，也不是叫學生不管家裏生產，他發明的辦法是使學生又能生產，又能讀書。異常巧妙的解決了一般需要與特殊需要的矛盾。

我們的夏陶然，可以作爲解放區農村工作者的典型。他不好吃好喝，穿着農民的短衣（我有一張他的照片），不是「老師」和「先生」，他拾豬糞，蓋房子，心裏終日盤算着的，不是自己當年的英勇，自己的汗馬功勞，自己的今日生活；而是窮人家的吃飯，養牛，收麥子等等羣衆的生活與困難。他去幹活，去勞動，而把收穫分給窮人，他還是受了些反對，甚至一開始農民也不完全滿意他。但他從無淒涼之感與寂寞的心情。

「夏陶然的道路」是一本工作手冊，爲每一青年工作者所必讀。願我們都從這裏學習到些東西。

關於學習問題給淮北區黨委的信

原文發表於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解放日報

按：這封信的作者劉子久同志，內戰時期任河南省委書記，抗戰時期曾任淮北區黨委書記，現仍爲淮北抗日根據地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四個月前來延安中央黨校學習。這封信，著作者原意是想託人帶去的，當經交給中央同志觀看時，中央同志認爲可以而且應該在黨的機關報上公開發表，並委託新華通訊社廣播淮北及各地，使各地各級領導機關中的同志以及廣大黨內外羣衆均能閱讀，因爲劉子久同志在他的言談，代表廣大黨內外羣衆說出了心裏想說的話，而他指出的弊病，作爲現象的一種，或一個問題，在我們黨裏，在各個抗日根據地裏，幾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去年整風運動中，這些弊病是在逐漸克服中。但是還沒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門，整風還未深入，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誇自滿、自高自大、官僚主義、脫離羣衆的風氣，並沒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認真關心羣衆利益，認真聽黨內外的民主，認真向廣大羣衆中間各個階層中的知識人物學習，發揚這些知識人物的諫議，當作推動全體工作的範例，這種作風，還沒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還須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們曾發表陳仲家的劇本「前線」與郭沫若先生的歷史論文「甲申三百年祭」，並印成小冊，發給同志們閱讀，目的都是幫助同志們整風，使我們黨內的不良作風早日得到清除，正確作風早日得到普及。現在又將劉子久同志的信發表，並將印成小冊廣送同志閱讀，同樣是爲着這個目的。

解放日報編者

淮北區黨委諸位同志：

我在中央黨校學習已經是四個多月。學習法是用反省的方式，去聯系實際，來檢討過去自己及黨的各種政策與工作，以求得把自己的思想搞通。現在將學習中反省到的幾個問題寫給你們看一下，是否對，尚不敢十分自信。

一 從『走夏陶然的路』說起

夏陶然同志，據說是我們二十五團的一個偵察員，因身體不好，在前年實行精兵簡政時，把他精簡了。精簡後，他到中潼村小學當教員，這個村子的學生很少，老百姓不願子弟上學，經他調查，知道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這個村莊太窮，學生念書與他們家庭生活之間的矛盾（困難）不能解決，所以常常是有先生，無學生，毫無生氣；而過去的一些先生們，則給這個村子的羣衆加上了一頂很『落後』『不開通』的帽子，以掩飾其辦學的無能。夏陶然同志到了那裏之後，從他同學生及學生家長的親切談話中與自己的切身經驗中，很快的看出了這個矛盾，並想出了解決這個矛盾的方針與辦法。方針就是把學生的學習與生產結合起來；辦法就是把那二十個小學生按照他們的家庭與本人的情況，採取自願的方式，編成幾個小組，如放牛小組、割草小組、挖菜小組、編筐小組等。這樣實行集體與互助勞動的結果，學生除了念書之外，生產方面，較他們在家裏幹活時的成績，還大得多。於是，在開學之後，曾被家長留在家裏幫助幹活的學生，又送來了，有些本來就未去上學的小孩子因看到這種情形，其家長也要求將他們的小孩子，送到學校裏，去跟夏老師念書。因此學生的人數就逐漸多起來

了。咬舍裏了，夏陶然同志就領導着學生進行修理。對學生的管理方式是，個別小孩子在學習與生產中不積極或好吵架的，不用自己去打罵的方式管教，而是動員學生羣衆去批評他，勸告他，這樣一來，那些好調皮的孩子，也老實起來，守規矩了。此外，夏陶然還利用了那個老師資格與地位，去爲學生的家中及村子裏的人排難解紛，他的文化程度頂多也不過是高小畢業生，可是他到中潼小學，不過半年的時光，就使得中潼附近，真是婦孺皆知了。那個小學家長，特別是那些小孩子們的母親，對於他們的夏老師的關心，愛護，從下面的事實中可以看出來。去年，陽曆八月間，二分區在前密（峯山區區署所在地，離中潼有六七里）開辦暑期小學教員訓練班，夏陶然也在那裏受訓。一個多禮拜的工夫，學生及其家長，沒有見到他們的夏先生，小孩子的母親很關心他，於是就湊了三四十個雞蛋，數十斤鮮梨，帶了七八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乘着一隻小船，到前密去看他們的夏老師。

當時正是淮水大漲，流急浪大，我也正在那裏作報告，看到這種情景，深爲感動。早在這個訓練班之前，二分區召開的小學教育研究會上，在所有小學教員的報告中，以夏陶然改造中潼小學的報告爲最主動，已引起人注意。許多小學教員聽了他的報告，都感到異常的興奮，驚奇與羨慕。主持這個會議的潘琪與江凌等同志，都大爲所動，認爲這是一種新發現。於是就想把這宣傳一下。爲拂曉報寫了一篇社論，標題爲：『走夏陶然的路』。這篇社論拿到區黨委去審查時（我記得是在陳店子松樹林內的會議室中，開民兵會議時大家傳看的），有的同志就認爲這是有關我們教育方針的大事，中央及華中局都沒有這樣的指示，我們不能這樣的提出問題，因而這篇文章，就未用原題原文與社論的形式發表。因之，夏陶然的那套辦學方法，當時也就未被我們採用與發揚。當時，潘琪、江凌等同志之所以

這樣的提出了問題，恐怕也還不是由於他們真正在思想上完全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大概是受了在解放日報上所發表的『吳滿有的方向』那篇文章的影響，他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帶有一種樸素的直覺的性質，尙未能把它提高到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原則高度，所以當時對這種意見紛歧的爭論，並不十分尖銳。然而『真理高於一切』，潘、江等同志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幹部與羣衆密切結合，一切爲羣衆服務，從羣衆切身需要出發去解決問題這個天經地義的真理，所以他們才這樣提出了問題。

最近，我在解放日報上看到西北局、文協、教育廳以及毛主席在延安大開學典禮的講話。解放日報關於教育問題的社論中所提出的教育方針，與一些模範小學與模範教師的介紹文章，與夏陶然所作的，竟不謀而合。這證明了夏陶然所走的路，正是我們在教育方面應該走的一條正確道路，夏陶然就是我們淮北教育領導中的吳滿有與趙占魁。

關於『走夏陶然的路』這個問題的爭論，從某種觀點看起來，似乎是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但以今天整風的眼光看來，則非同小可，這是羣衆創造天才的體現。而我們當時處理這件事情的經過與態度，是反映了我們在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的保守性，缺乏辯證唯物論的革命性與創造性；是反映了我們的羣衆觀點與羣衆路線的不够；是反映了我們的不大相信羣衆的創造能力；是反映了我們的眼睛向上，不肯向下，不肯向羣衆學習；是反映了我們不大懂得『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問題。

我更進一步的回想了一下，在我們那邊，像夏陶然一類的人物，還有不少，如挖河工人中的周大華，災民中的『磅子』老滿，臨淮頭山東幫的婦救主任（名字我記不清，林了同志曉得），其他如擴

軍英雄，民兵英雄，模範戰士等等，如果我們認真的仔細的去檢查一下，還可發現許多。這種羣衆中的天才、聖人、狀元、領袖、諸葛亮，本來就有；在我們今天的新民主主義政權下的土壤中，就更容易發生滋長。像吳滿有、趙占魁等新型的英雄人物，我想決不會只在陝甘寧邊區能出，其他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都同樣能出，只是因爲我們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有毛病，未被我們所發現，黨與政府及軍隊內部的官僚主義，把他們壓住了。即偶而被發現，也未被我們所重視，而予以應有的發揚光大，夏陶然就是這樣一個例子。這正如古人所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幾句話，可以代表我們某些時候的某種情況。吳滿有、趙占魁等人，遇到了毛主席高崗同志等這些伯樂，就成了轟動一時的英雄人物，其他如吳、趙一樣的人物，假如沒有遇到一個伯樂，就淹沒無聲，與草木同朽了。可是我們是最進步階級與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應該一變歷史上的狀況，就是說，在我們黨內，在我們的抗日根據地內，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馬，而且有很多伯樂的，埋沒英雄的現象，是不應該有的，一時有這種現象，是應該很快消滅的。

這種從發現與發揚各種各樣的英雄人物、模範人物着手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不惟是推動與開展各種工作的一把鑰匙，一個槓桿，而是一種發現與提拔新幹部的最好最重要的方式。經過這種方式所發現與提拔的新幹部，其本身就具備着聯繫羣衆及工作中的創造性兩個基本條件。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也比較用別的方式所發現與提拔的爲大。而且提拔他們之後，別的幹部也不能不服氣，去說怪話。因此，我希望我們能够從上面這一個『小小的』具體的現實的例子中，得到一種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的啓示，並以之去教育與鼓勵我們的幹部、黨員與羣衆，則我們在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上，一

定會引起一個很大的轉變與進步，不知你們以爲如何？

但我並不是說，夏陶然這個人就是十全十美，毫無缺點；他所採用的教育方針與辦法，也已經是一個盡善盡美的東西。相反的，恐怕他自己也還是剛摸索出來的這一套辦法，還未自覺的把它提高到理論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的原則高度，在他還是帶有一種樸素的性質，還處於一種萌芽狀態。但這一切，不可避免的缺陷與毛病，並無損於他這件事情之有偉大的意義。而我們當時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正是因爲我們不了解這件「小事」的偉大意義，而加以發揚光大，使之條理化，系統化，把它那不自覺的階段，提高到一種自覺的階段，而這樣做，正是我們的領導機關應有的與主要的任務。我現在的認識如此，不知你們以爲然否？

二 正確的口號，錯誤的方法

我們很早而且不止一次的提出過創造模範村，鄉，連隊，支部的口號，並且訂出了具體的競賽、突擊計劃。但據我所知，這我離開淮北時止，仍未能創造出一兩個真正稱得起模範的村，鄉，連隊與支部。即便有時創造出了一個半個，也僅僅是熱鬧一時，不久便消沉了，而未能堅持下去。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第一，就是由於我們不懂得，或者忘記了一個最簡單，最顯明，最初步的真理，即無論作什麼事，都是由人去作，而且都是由小處近處開始。因此，我們要想創造模範村，鄉，連隊……就必須從創造一批模範人着手，如模範村長，鄉長與人民，模範的連長，指揮員與戰士，模範的支書，支幹與

黨員……吳滿有與吳家棗園，劉玉厚與郝家橋，劉建章與南區合作社，夏爾然與中灌小學，都是實際的例證。沒有這樣一種新時代的模範人物，自然不能創造出一種新時代的模範事業，如模範村、鄉、連隊等。同時模範村、鄉、連隊與模範人物是到處都有的，但是假若我們不去發現、表揚、提高、幫助這樣的模範村、鄉、連隊……則這些模範村、鄉、連隊與模範人物的發展，也就會受到限制。我們應當依靠着這些模範村、鄉、連隊與模範人物去推動一切的村、鄉、連隊與各色人物，以創造出更多這樣的模範。這就叫做相得益彰、互相發展。而起決定的能動作用的是模範人，過，我們是不懂得這種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我們所用的方法常常是倒行的，是從主觀的願望去創造模範村、鄉、連隊……開始，而不是從原有村、鄉、連隊裏去發現模範人開始，這是不合乎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也就是主觀主義的。所以，我們創造模範村、鄉、連隊的正確口號，由於我們在實際行動中的方法錯誤，結果就變成了不能實現的空喊。

第二，爲什麼有時我們也創造出了若干的模範事業，但是常常不能夠持久呢？這也是由於前面所說的那種錯誤的思想方法而來的。因爲，我們既把創造模範村、鄉、連隊的口號，提得很高，而又沒有從發現原來模範人物的正確方法開始，爲了完成任務，就不能不使用外力，從別處湊集一批幹部送到那裏去進行突擊，去代替，包辦，去『加油』，『打氣』。這樣，有時也能够搞得熱火朝天，但這種熱鬧，既不是由於內在力量的『自力更生』，也沒有在突擊過程中去打下基礎，一旦這種代替，包辦，『加油』，『打氣』的外力一去，就好像拔了氣門塞的氣球一樣，很快就消失下去了，這是自然的道理。

最後，就是我們在提出創造什麼模範的口號與計劃時，往往是採用多頭並進，全線出擊的方式。例如，提出培養創造一個模範區，每區創造一個模範鄉，每鄉創造一個模範村……沒有或者不會去運用『一號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集中力量，突破一點，取得經驗，推進全盤』的思想方法與領導方法，所以我們也就常常是『貪多嚼不爛』，事倍功半，甚至『徒勞無功』！

三 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

我回想起來，我們在過去的工作當中，曾經有過不少好的東西。如幾年來宿東、蕭縣等地的敵偽軍工作；前年冬季大『掃蕩』後泗宿、淮泗等處的民兵工作；去年春季疏濬柳溝河、溧河、安河等工程中某些勞動組織；去年夏天，在泗南、盱鳳嘉、泗五靈鳳等地，曾經風行一時的『論戰大會』；第三、四等期輪訓隊的整風學習；淮北中學的反奸鬭爭；師直及各旅、團、營的反軍閥主義的鬭爭……這些東西，都是一些良好工作的萌芽。中央就是從這種萌芽狀態東西的研究中，找出了對敵鬭爭、組織勞動、發展生產、整風、森查幹部等各種指導方針。各地並根據着這些方針，作出了許多輝煌成績。我們對於那些萌芽狀態的好東西，未能追根究底的把它們鑽研一下，找出其發展規律，經驗教訓，使它們由感性的東西，上升為理性的東西，以便再回到實踐中去，推動我們的事業和繼續豐富我們的理論。我們沒有這樣做，因而使這些良好的萌芽，因為沒有得到我們適當的灌溉培養，也就未能滋長壯大，開花結實，而自生自滅，荒蕪枯萎了。我認為這是我們幹部的理論水平不能很快提高，進步太慢的主要原因。

同時，我們也會遇着許多困難，犯過許多錯誤，而這些困難與錯誤，也都因為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多半沒有得到及時的解決與糾正。例如，我們有許多地方工農幹部，因為積極參加工作，就誤生產，其結果，他們的家庭經濟地位，有的不但沒有像一般羣衆那樣上昇，反而日趨下降，弄得他們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大不滿意，親戚朋友，鄉鄰故舊，都無好評。因此，他們對於工作愈努力，愈積極，就常常愈脫離羣衆。在泗南等地，曾經發現過不少在黨認爲是『模範』的幹部，其中也大部對他們有『反映』（即說他們不好之意）。這些地方工農幹部，積極爲黨工作，與他們自己及其家庭生活困難不能得到適當解決這一矛盾（這個問題，在陝北及其他地區，在提倡發展家庭生產中，已得到圓滿的解決），很早就被我們發現，迄我離開淮北時爲止，尙未找到適當的解決辦法。其他，如機關支部都搞不好；許多幹部感覺到工作中心太多，顧此失彼，掌握政策上『左右搖擺』，『朝令夕改』；幹部在工作中常常發生『疲塌』與『老一套』等問題，都是早已被我們感覺到的。只因我們缺乏追根究底的鑽研精神，困難就長期的拖延着，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錯誤也就一再的重複着，不能及時的糾正。因此，我們在工作開展與幹部進步上所受的損失，實在是難以計算的。

假若，我們對於自己所做的各種工作，無論是成功的也好，失敗的也好，都能以追根究底的精神，及調查、研究、分析、綜合的方法，把它們鑽研一番，我想，一定能够找出個『所以』與『竅眼』來，而這個『所以』與『竅眼』，就會成爲我們工作開展的『槓桿』與幹部進步的『酵母』。

四 我們怎樣去發揮幹部的積極性與創造性？

我們常常提出發揮幹部（一般黨員與羣衆也是一樣）在工作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問題，但是，在我們的幹部中，却不斷發現有所謂『疲塌』（不積極）與『老一套』（無創造性）的現象，其故安在呢？這，其中原因雖多，若從我們的領導方面來檢討，我認爲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的領導作風不够民主，工作方法不够科學。

平素聽到人家說我們不民主，總不大以爲然，覺得有點不大舒服。但果真自己反省一下，不民主的地方，就不但有，而且還不少呢？我現在就舉幾個例子：第一個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們從豫皖蘇邊轉移到皖東北之後，所有地方工作幹部，都住在底鎮附近的黃莊一帶休息，當時，就想利用這個時機，檢討一下路西這一段的工作。開始有許多幹部都不肯講話（後來講話的是很多了），因之就叫他們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但他們寫出來之後，又都不肯署名，怕報復。結果，幹部對黨的領導機關與領導人的意見書，變成了『匿名揭帖』與『不記名的投票』。第二個，是同年夏天，在仁和集會議上那場『風波』，主要的是過去領導作風不够民主的反面結果。第三個，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到花園莊輪訓隊，去徵求那裏的幹部對於我們的意見。他們首先提出而且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他們對於領導機關與負責同志的意見，是否能講（大意如此，原話記不清了）。我想我們的幹部，像在整風輪訓隊這種場合，無顧忌的提出他們對於領導機關與領導上的意見，是他們應有的，任何人也不能剝奪的一項權利。可是，他們竟把這種每個黨員應有的權利，當做他們發言的一種前提條件來提出，是頗值得

我們自己反省的。第四個，是同時的輪訓隊內，石立同志（他與狄克東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掃蕩」中，犯了錯誤，經過我們指出，他們已承認，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已開始堅決轉變之際，又被決定予以撤職處分的）。反省筆記中寫着：他有些意見，很想找我談談，可是他有幾次走到我的門前又返回去了，始終沒有進去談，結果還是裝在肚子裏回去了！（也是大意如此，原話記不清了）這種例子，如果我們平心靜氣的想一下，還可以舉出許多來。假若這種不民主的現象讓他繼續在黨內存在下去，而不迅速的加以克服，又怎樣能够像毛主席在論新階段中所說的，表現出我們的「領導機關、幹部、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活躍，敢於與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呢？怎樣能使這些幹部們在工作中「提起勁來」，而不常常「鬱鬱不得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呢？

但是，他們對我們並不是沒有意見。其所以不肯披肝瀝膽，開誠佈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就是怕說出來之後，上級常常不理會，或者還會因此出岔子，因此，他們就服膺那兩句「是非皆因多開口，煩惱只緣強出頭」的格言，不肯去多嘴多舌，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們既有意見，而又沒有說出來，悶在肚子裏，終算得有點不大舒服，就必然會發生「當面不說，背後亂說」，「會內不講，會外亂講」等自由主義的現象。因此，什麼「小廣播」，發牢騷，說怪話等歪風，也就常常當作對於領導方面不民主的一種懲罰而出現。我在中央黨校，看到許多好說怪話，發牢騷，不安心的幹部，自從毛主席及黨中央號召每個同志，在整風當中，「有話就說」之後，讓他們在黨的會議上，痛快快的發了幾次牢騷，他們就心平氣和，比以前規矩多了。這些幹部，絕大多數，在政治上對黨是

忠實的，對革命是有功績的，有些是由於領導上的不民主而造成了他們的不滿，若不用發揚民主的方式，使他們自己去把腦子裏那些好東西及髒東西一概倒出來，好的給發揚，髒的給洗乾淨，他們是難以接受別的好東西的，因為他們的腦子裏既然藏着一部份（有時是很多）髒東西，就是勉強灌一點很好的東西進去，也很快就被原來裏邊那些壞東西傳染了。沒有民主，則好的意見得不到承認。如果一個人腦子裏藏着很多髒東西，在沒有得到機會傾倒出來之前，他們是看不到他們自己有什麼缺點的。就好像在一個人未照鏡子之前，看不到自己的臉上有灰是一樣。這樣，你說他臉上有灰（有錯誤），他會不相信（不接受批評），更不會自動的去洗臉（自我批評）。我們在去年的整風當中，也曾經不斷發生這類現象，不過未被我們認識到這是一種重要的思想領導法則，而把它加以發展與普遍運用罷了。

在發揚民主的條件下，一般幹部對於工作積極性的提高與創造性的發展，是有密切聯系與相互作用的。一個在工作中被發揮了積極性的幹部，其創造性必大；同時一個在工作中被發揮了創造性的幹部，其積極性也必高，那是一定的。蘇聯的斯塔哈諾夫，陝北的吳滿有，趙占魁，晉察冀的李勇等人，就是這一方面具體例證。因為這樣一來，他們自己已經看到：他們不是專供別人驅使剝削的奴隸，而是打破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主人，而他們自己原有的不可避免的許多缺點（如狹仄等），也常常在自己的奮鬥與發展中洗掉了。

在發揮幹部工作的創造性上，另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工作方法的科學化。我這裏所要說的，就是：『什麼是創造性？創造性是怎樣產生的？』這兩點，我們常常把工作中的創造性抽象化，神秘化了，認為這是那些天資聰穎，學問淵博，地位優越的少數人的特殊任務與專利品，非一般人所能及。

假若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什麼是創造性？創造性是怎樣產生的？」我恐怕就有不少幹部答覆不出。這樣，你天天去喊叫發揮什麼創造性，豈不「見鬼」麼？

我認爲我們需要的創造性，並不是那些「奇技淫巧」與能「降妖捉怪」的東西，而是那些凡是能爲羣衆與剷除害，能幫助羣衆克服困難，提高工作效能，戰勝敵人，解脫剝削壓迫，推動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任何發明與發現，不論是大小與多少，都是應當爲我們所發揮並發揚的創造性。因此，瓦特的蒸氣機，馬克思的資本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等，固然是人類歷史上有劃時代意義創造性的東西，值得我們大發揚而特發揚。而吳滿有的「變工隊」、「扎工隊」、趙占魁的工作方法工作態度與管理工廠辦法，劉建章的南區合作社經營辦法，夏陶然的教學方針方法等等……又何嘗不是偉大的創造，也同樣是應當被我們發揮與發揚，有偉大創造性的東西。而這些歷史人物的創造性之產生，既不是神人傳授，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從那些具體的現實的極平常的客觀事物與環境出發，去不斷實踐，反覆研究而得的結果。瓦特的蒸氣機，是從一個開水壺蓋子被蒸氣衝擊而跳動開始研究而得到的結果；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從研究眼前的一般商品開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是從研究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情與十月革命後的國際環境出發；吳滿有等人的「變工隊」、「扎工隊」是從研究陝北這種分散的個體的小農經濟生產如何變爲互助生產出發；趙占魁的工作方法與工廠管理辦法是從研究一個人數不多的手工工廠生產出發；劉建章的南區合作社經營辦法是從研究一個僅有一百六十名社員，一百七十九元九毛的股金的小小合作社開始；夏陶然的教學方針與辦法，也是從研究一個家庭窮的不能維持生活的小學生的中濠小學出發。因此，凡是願意「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埋頭苦

幹，深思熟慮，決心爲羣衆服務，而又肯向羣衆學習，不論是個人和集體，就必然有創造性，而且一定能够創造出一些造福社會的新東西出來，是可以斷言的。

因此，假若我們能够好好的發揚黨內的黨外的民主作風，爲黨內黨外的幹部與羣衆造成一種發揮他在工作中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的環境，告訴他以『實事求是』、『打開腦筋』的分析的科學思想方法，再加上一種爲羣衆服務向羣衆學習的羣衆觀點，則所有那些對黨對革命忠實的幹部與羣衆，不用說一定會朝氣勃勃，日新月異，就是那些兩條心的份子，也會在這種『治病救人』的民主作風之下受到感動，在這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面前心服，引起他們自己的坦白與轉變的。在他們自己坦白轉變之後，也可以在工作中創出一些新東西出來，有些並且是很有價值的。在延安已有很多的實例。這樣一來，所謂工作中的創造性，就不是某些少數個人的特殊任務與專利品，更不是什麼神秘的東西，而是變成了一種廣泛的羣衆性的東西，變成了一種羣衆運動。這樣一來，在我們幹部所常有的那些『疲憊』、厭倦、消沉、苦悶與『老一套』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的現象，也就不攻自破一掃而光了。

五 爲了誰？對誰負責？

假使向我們黨的幹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們一切工作都是爲了誰？都應當對誰負責？有許多同志會這樣的回答：都是爲了黨與上級，都應當對黨與上級負責。這當然也是對的，既然是黨與上級交給他們這些任務，他們是應該向黨與上級負責的。

但是，我們對於這種回答，還不能滿意，因爲還不完全對。假若再問一下，整個黨的工作又都是

爲了誰？又都應當對誰負責呢？我想恐怕難有些同志答不出來或者答覆得不適當。

我們的黨既是爲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大眾謀解放的，那麼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是爲了無產階級及一切人民大眾，並應當對他們負責，正是當然的。但就是這樣一個看起來好像很簡單的真理，在我們的同志中，尙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還沒有把它搞通，因之在實際工作中，也就常常犯錯誤。使黨與自己脫離羣衆，與羣衆對立起來。

黨所領導的各種工作，不僅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棉植樹，挖河築堤等等，完全是爲了羣衆，是羣衆自己的事；就是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等，也還是爲了羣衆，也是羣衆自己的事。但是因爲黨的利益與羣衆的利益，應當完全一致的這一基本思想，在不少幹部當中，沒有把它弄通，於是他們在實際工作中，就常常不是眼睛向下，而向羣衆，爲了羣衆，對羣衆負責，而是眼睛向上，背向羣衆，單純的爲了上級與對上級負責，在他們心目中，是把黨和上級與羣衆對立起來，把對黨對上級負責與對羣衆負責對立起來。因此，就不僅在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工作中，常常發生強迫、命令、打、罵、關、罰等等脫離羣衆與羣衆對立的現象，在泗宿就會因爲徵收公糧發生過逼死老百姓的事！就是在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棉植樹，挖河築堤等工作當中，也不止一次的發生強迫命令，以至打、罵、關、罰的事情。泗南就會經有一個工作同志，因爲增加工資問題，打過一個僱工兩個耳光！這好像是一件怪事，然而這却是事實。

正因爲有些幹部，對於爲了誰？對誰負責？即黨與羣衆的關係及怎樣去領導羣衆這一個基本問題，在思想上沒有搞通，於是就不僅徵收公糧公草，擴軍破路打仗等事，在羣衆看來，都是爲了黨，

政府，軍隊幹的，而不把這些看作羣衆自己的事，常常發生隱瞞謊報，違抗逃避的現象；就是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種棉植樹，挖河築堤等工作，在有些羣衆看來，也好像是爲了那些工作同志去完成上級所給予的任務，而不得不做似的，因此，什麼『明減暗不減』，『明加暗不加』，拖延敷衍，應付『差事』的現象，也就都來了。這就叫做『事與願違』。

有些幹部，爲了有效的去完成黨與上級的任務，對黨與上級負責起見，有時就不惜對羣衆採用強迫命令，以至打罵威逼的方式。可是，在這些幹部犯了這種官僚主義，軍閥主義的錯誤之後，爲了維護黨與上級在羣衆中的影響與威信起見，就不能不給他們一種處分。這對於那少數乘機搗亂，『兩條心』的份子，固然是罪有應得，人心稱快；但對於那些真正是忠心耿耿，爲了黨與上級並對黨與上級負責的幹部，則是『兩不討好』，『啞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了。

我們的許多幹部，這種缺乏羣衆觀點的態度，不但在執行政策上是如此，對於各種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採用與實施上，也是一樣。我們已建立或要建立的一切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都是爲了廣大羣衆的利益與對敵鬭爭之所需，那麼，假若現有的某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廣大羣衆的實際生活中，已成爲一種『盲腸』，或者某種尚未建立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羣衆看來已經成爲必要時，前者如鄉村及連隊一些繁雜的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後者如戰鬪英雄勞動英雄與模範工作者會議，擁政愛民與擁軍制度等，我們就應當根據着廣大羣衆實際生活的需要，大膽的向上級建議取消或建立，或者就直接了當的把它取消或建立，才是對的。但是過去我們多半沒有這樣做。有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在廣大羣衆看來已經沒有意義，我們的幹部常常藉口於這是上級的指示與規定，不敢稍有變

更。同時，某些東西，在羣衆的實際生活中已成爲像空氣一樣的需要，我們却又藉口於生級沒有決定與指示，也不敢建議，或自動的增設，這些都是缺乏真正羣衆觀點的表現，只要有真正的羣衆觀點，就不會採取此種不負責任的態度；自然這種從真正羣衆觀點出發的負責態度決不能被那些黨性不純的幹部作爲不服從組織領導，對黨鬧獨立性的藉口。一九四二年冬與一九四四年春，西北局的兩次高幹會議，對於許多會議制度與組織形式，例如軍隊中的某些組織形式與工作制度（詳見譚政同志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已經這樣做了。他們這種革命的而不是保守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們那裏，羣衆中有幾種相當普遍而值得我們注意的說話，一種是：『老皇那裏稅多，頑固那裏罪多，新四軍那裏會多！』又一種是：『新四軍什麼都好，就是開會太多不好！』再一種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某人來講話！』我認爲這是對於我們在開會講話問題上，缺乏羣衆觀點的主觀主義的同志們一種辛辣的諷刺，然而我們有很多幹部，並沒有從這種諷刺（羣衆的正確呼聲）去得到應有的教訓。對於這種呼聲，充耳不聞，能够算是有羣衆觀點嗎？

『從羣衆中來，到羣衆中去』這一正確思想，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不僅在製定鬭爭綱領時『要這樣做，不然，你所製定的鬭爭綱領，就是『無的放矢』；而且在選擇工作方式時，也要這樣做，否則你所選擇的工作方式也是『張冠李戴』，保管會要碰釘子的。我們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常常是信心十足的乘興而往，垂頭喪氣的敗興而歸，有許多就是這個緣故！

『鑿工隊』、『孔工隊』、『唐將班子』、『秧歌』、『教育合作社』、『衛生合作社』等，是今天在陝北的生產、文化、衛生運動中最爲廣大羣衆所了解歡迎，能够接受的組織形式與工作方法，

陝北的黨就運用這些方式、方法，有效的達到組織勞動，發展生產，豐衣足食，普及文化的偉大目的，這種經驗，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總之，我們應當根據着廣大羣衆的鬭爭經驗，覺悟程度，歷史傳統，文化水平，生活習慣等等具體情況，去奠定我們的鬭爭綱領（工作要求與工作決定等）與選擇我們的組織形式及工作方法，絕不能單憑在我們自己腦子裏所想出來的鬭爭綱領與工作方法，拿到羣衆頭上去硬套，或者拿了這樣的主觀主義的東西作爲我們測量廣大羣衆覺悟程度與積極性的尺度。這就好像我們應當照着腳去做鞋，而不能照着鞋去做腳是一樣的道理。

六 我的聲明與希望

上面我所寫的這幾個問題，是我個人在黨校幾個月學習當中，對於過去工作的一點初步反省。而這種毛病，我看我們幾個人中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罷了，在此我要順便聲明一下的，就是：我在上述幾個問題的反省中，幾乎都是講的錯誤與缺點，正確的與好的東西就沒有提。但這絕不是說，我們幾年來的艱苦鬭爭與各項工作，沒有正確的與好的東西，完全不是這樣，我們的正確的好的東西是很多的，我們是執行了中央與華中局的正確路線，並且獲得了很大成績。假如不是這樣，那麼，在如此複雜的環境中，我們就根本不能在那裏堅持鬭爭與開展工作，更說不到還會有很大的發展了，並且我的意思，也不是故意光說壞的，使我們自己洩氣。我之所以這樣，是由於我認爲在我們的領導工作中確實存在着缺點，我們還沒有想通領導方法上的全盤問題。就拿我們所有正確的好的東西來說，許

多也還是處於一種摸索階段，許多東西，還並沒有被我們系統化、條理化，並沒有發展到高度自覺的階段，這就是由於思想領導上的薄弱。而這種思想領導上的薄弱，正是我們在領導工作上的最主要缺點。這也就是我們在整風學習當中，對於學風不得其門而入，不大感覺興趣的主要原因。不知你們以為然否？

最近的國際形勢，對於我們，真是空前有利，近幾個月的淮北抗日鬭爭，也是最近幾年來沒有過的開展，今後的形勢，有可能更好，我們的各種工作也可能有更大的開展。但是，在此，我認為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幾年的抗日戰爭中，我們也吃過許多大虧，而又都是在我們獲得很大勝利與發展之後吃的，這種例子，可以舉出好些個，總之，在抗日戰爭中，在一個比較大的勝利與發展之後，就要受一次損失，這幾乎成了一種規律。同時，有不少的進步人士與中間人士，在我們困難時，曾經靠近並幫助過我們；在我們勝利與發展時，反而離開了我們。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反省與深思的，俗語說，吃一虧，長一智，失敗為成功之母，我們是決不怕困難的，我們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怕指出自己的缺點，因為我們對於我們事業的正義性，是認識得很清楚的。我們是有完全的勝利信心的，我們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我們的成績又是很大的。只要我們能認真反省缺點，認真打通思想，提高自覺性，去掉盲目性，我們就會大進一步。

我寫這封信，主要的是作為自己的反省，寫給你們看，同時也希望你們作出決定。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夠變為引玉之磚。寫得太多了，不再寫下去了。致以

同志的敬禮！

子久

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



夏陶然的道路

1947年9月初版 佳. 15000.

定價

1.80-